昆明学院学报　2018，40（4）：116～124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语言·文字】

抗译性与交流性：英汉诗歌文本的维度分析

陈文慧[1]，鲁琳颖[2]，心　语[3]
（1.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2.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口腔医学系学生工作办公室，云南 昆明 650106；3.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汉语古诗英译的文本可以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民族审美、跨文化交流和译者主体性等五个维度进行分析。通过文本比较的方式，以目标读者接受作为评价译文质量的一个侧面，展开对诗歌语言文本的跨文化翻译研究。汉语古诗英译需要在传达原诗形式和意义基础上，最佳地实现诗学功能的语言结构，尽可能地表达文本深层文化、诗意和意境的对等。因此，诗歌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相比具有更多的翻译不确定性和可交流性。

关键词：古诗英译；语言文本；维度分析；可交流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8）04－0116－09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8.04.018

Translation Resistance and Communicability: A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 Texts

CHEN Wenhui[1], LU linying[2], XIN Yu[3]
(1.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2. Students Affairs Office of Stomatology Department, Haiyuan College,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106; 3.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Chinese classic poet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thesis offers a textual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 from five dimensions: linguistic & philological, historical & cultural, ethnic and aesthetic, inter－culturally communicative and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The thesis believes that reception through readership as a means of quality control demands not only equivalence in form and sense, but also in cultural profundity, poeticality and artisticality, and it therefore proposes that poetry text is more translation resistant than other literary texts, but is adequate in communicability.

Key words: Chinese classic poet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language text; dimensional analysis; communicability

一、引言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本质，在文学研究中，总有一条脉络能够把语言和文学作品系统地总体地串联起来。[1]56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文学文本被置于一个较为不受重视的地位，但是在理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文本始终没有缺位。本文拟以汉语古诗英译的维度理论入手考察和分析古诗英译过程中的英汉文本。关于汉英文本，很多学者作过不少论述。有学者认为，工具性，思想本体性和诗性[2]是文本的基本维度；也有学者认为音形义是文本的基本维度。从人类认知过程的角度来看，语言文本的维度大概可以包括语言维度、交际维度、文化维度、审美维度和译者主

收稿日期：2018－05－13
基金项目：云南省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语古诗词英译的接受语境研究”（YB2016059）。
作者简介：陈文慧（1977—），女，云南昆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
鲁琳颖（1989—），女（拉祜族），云南昆明人，助教，本科，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
心语（1991—），女，云南昆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口译研究。

体性维度等。首先，在语言维度上，不仅音（文字的听觉感受）、形（符号的视觉感受）、义（心理的认知感受）是基础，还有构成语义、词法、句法和篇章的规则也是语言文本维度的范畴。其次，在语言文本的交际维度上，有学者认为交际维度的范畴包括：对话、理解、模糊；语境、范围、方式；交际维度的过程包括题材（field of discourse）、诗歌中话语模式（mode of discourse）、对话中的语调（tenor of discourse）。[3]第三，就语言文本文化维度而言，思想内涵、历史传统以及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通过语言实现交际过程中所体现的人际关系、物我关系等均属于文化维度的界线。第四，语言文本的美学维度则包括：含蓄之美、简洁之美、对称之美、押韵之美、意境之美，等等。第五，译者主体性维度主要考虑译者主体性与诗歌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该主体性对文本所能够发挥作用的程度。

以上是对语言文本的一个总体概括，但具体到诗歌，其语言文本特质虽然没有超出上述语言文本的五个维度，相较于其他几个维度，却更加强调其审美维度；相较于其他的艺术品种，诗歌又更加强调形式以及由形式所产生的语境和意境。按照迈纳的说法，一种诗学的产生有赖于其他不同但独立的知识类型的存在。……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还必须考虑到生产方式。[4]而诗歌的诗学也同样如此，既与其他艺术种类不同，又是一个完整的审美体系。以上对诗歌文本的论点可能具有模糊性和片面性，缺乏较为具体的分析。论点模糊是因为有关诗歌文本特点的研究已有不少，这里不再赘述；论点片面则是因为以上论述缺乏跨文化的比较，在定义一个概念时，比较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因为只有在比较中，人类的认知才能在概念的理解中得以提升。因此，就诗歌文本的跨文化而言，文本比较对于诗歌的翻译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正如刘若愚所言：译者应当关注什么样的中文结构能够实现语言的诗学功能，什么样的英语语言结构能够实现相似的诗学功能，译者的职责就是努力确立最佳地实现诗学功能的英语语言结构。[5]本文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跨文化交际和民族审美等五个维度对汉英诗歌文本进行比较和分析。只有通过分析比较，才能对中国汉语古诗英译的接受效果作出更进一步的判断，因此，比较分析的手段对本文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Peter Stockwell 在其论著中提到文本在诗学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文本肌理是认知诗学的最新发展；文本肌理中蕴含着语言风格、语言心理、批评理论；他的书围绕文本肌理探讨了诸如共鸣、移情、读者认同等美学和文学批评基本问题。[1]56－105

二、诗歌文本的语言文字维度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说过，汉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思维模式。他认为，汉字的基础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南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6]很多学者就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汉英之间的差异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在种类属性方面，汉语属会意语言（ideograph language），而英语则属拼音语言（spelling language）；二是在语音发声方面，汉语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而英语是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三是在字形结构方面，英语只有词（alphabetic script），汉语是既有字又有词（ideographic－oriented syllabic script），而字又有多种：象形字（pictograph）、指事字（indicative character）、会意字（associative character）、形声字（morpheme－phonetic character）等；四是在语义结构方面，一般而言，汉语一个字所能够包含的信息量往往多于英语中的一个词；或者说汉字在表达同样概念所占据的空间一般小于英语语言所占据的空间。除此以外，在语言文本这个维度上，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还存在着句法、语篇等方面的差异，在解读诗歌文本过程中，这些差异同样不可小视。

由于汉字的特点所产生的语言文本使汉语诗歌的生产过程大大区别于英语语言文本对于英语诗歌的创作构建过程。首先，从古典诗歌文本的音质来说，汉字几乎都是单音节的字和词，其所产生的格律、节拍、韵脚都与英语诗歌文本有着巨大的差异。其次，在形式上，汉语古诗有七律、五言绝句

等，在词中还有词牌名等约束性的写作要求。第三，在语义和语用方面，汉语古诗词也有很大不同，如汉语的回文诗。以下就以许渊冲先生翻译唐朝诗人韦庄的《台城》为例对诗歌的汉译英进行语言文本维度方面的分析。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译文：

Over the riverside grass falls a drizzling rain;

Six dynasties have passed like dreams, birds cry in vain.

Three miles along the dike unfeeling willows stand,

Adorning like a veil of mist the lakeside land.[7]259

从汉语语言的音、形、义三方面来看，基于这首古诗翻译在汉、英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得与失，可以发现：第一，从视角上看，英语和汉语的形式和格式很难对齐，而格式和形式是汉语古诗通过语言文本来实现理解和审美的过程，这种空间差异对源文本读者来说是有着一定意义的，而译文并没有将其传达出来，两种文字之间的空间差异也可能会形成“疏离感”。汉语古诗还有一个视觉上的特点，也与英语（甚至西方）诗歌有着较大不同，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律”①。第二，从听觉上来看，上述译文中第 1、2 行互相押韵，第 3、4 行互相押韵，这基本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韵律。但并不是按原文的韵律排序，原文是 AABA 的韵律，而译文的排序则是 AABB，更不用说其中的平仄韵律和内在联系了。第三，从语义上分析，该译文基本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但是，语用是否能够对等依然存在疑问。从语言文本这个维度来看，这首古诗的翻译基本达成了信息转义、形态变换和音韵转换，但是对于诗歌翻译来说，还应包括更多的内涵，即意象和意境。就语音而言，“汉字和英语词汇的语音各具特色，音意之间的联想关系也不相同。英语是典型的语音中心主义，语音具有抽象性，语音与语义之间几乎没有关联。”[8]

三、诗歌文本的历史文化维度

十八九世纪英国思想家罗伯特·欧文说过，人是环境的产物。每个民族都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经验，由此所产生的世界观也大为不同。诗歌也是环境的产物，是人们对自身环境的情感反应而做出的一种表达。那么不同地域的民族在与自身的环境相处的过程中，既可以拥有人类重叠和共同的生活经验，也会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在诗歌的创作中，不同环境中的事物激发出不同的语境，从而导致意象不同、意境各异。长久积累的这些经验和体验形成了历史文化的差异。“文化是人类在人本身的自然及外部自然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选择、创造并保存和演化中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9]从这个维度上看诗歌，各个民族的确大相径庭。就题材而言，在汉语古诗中有边塞诗歌“长河落日圆”的孤寂；在英语中有惠特曼通过对美国边疆河山的赞美来表达政治诉求②。即便是同样的题材，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东西方的文学特征也不尽相同。从跨文化视角对比分析苏轼的《江城子》和 17 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梦亡妻》（*On His Deceased Wife*）③，可以看出两首诗表现的诗学是不同的：前者在艺术表现上主写意、传神、婉约，而后者主写实、逼真、豁达。[10]

以下就吴均陶先生翻译的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为例来分析古诗英译中的历史文化维度所能够产生的对等：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译文：

The crows caw to the falling moon;

The frost air fills the sky.

The fisher's lights gleam, the maple croon;

①关于这一点，可参阅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可参阅 Walt Whitman 的“Song of Myself”。

③有关弥尔顿诗歌的翻译，可参阅：朱维之译，《弥尔顿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With much sorrow I lie.
On the outskirts of Suzhou Town,
From Han Shan Temple, hark!
The midnight vesper bells come down,
Wafting to the rover's bark.[7]197

接受理论的要点之一，就是从读者的立场看问题。在古诗英译的过程中，大部分目标读者应该是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在分析译文中，有几个意象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地名意象，如姑苏城、寒山寺分别被译成 Suzhou Town 和 Han Shan Temple，然而，这些地名对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有着历史和文化的意涵，也就是说，这些历史文化意涵对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具有某种意象的联想，而到了目标读者那里，这种意象联想是否能够与目标读者的意象联想一致，使之能够达到如奈达等人所说的在受众中再现最接近源文本的对等效果[11]，依然存疑。二是自然景观意象，如 The crows caw to the falling moon; //The frost air fills the sky 对于长期浸润在中国诗意氛围的中国读者（源文本读者），类似这句诗句的心理联想和效果自然不用分说，但是对于目标读者所能够产生的心理效果和联想就很难确定是否等效了。三是整体意象，即整首诗歌所能够给目标读者带来的意象联想。显然，这需要目标读者加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入了解，而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对目标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切实际，也非常奢侈，对于文化的推广形成了较大的障碍和阻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即便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没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积淀，都很难对汉语古诗进行深入的了解，更毋庸目标读者了；要求他们通过阅读产生思维的联想，进而实现对整首诗歌意境的理解和感受，这就更难了。从翻译伦理理论和原则来看，如果无法传达古诗原文的真实意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违反了翻译伦理，即在翻译伦理中，追求真理已经成为公认的最高美德，译者伦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尽可能地覆盖源文本的意义，采取一切手段去抵达目标文本的边际意义。[12]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果要求、甚至强迫目标读者去对诗歌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同样有违翻译伦理。

四、诗歌文本的民族审美维度

在中国所谓的“诗话”中，审美的价值取向是对诗歌的一项重要诉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今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诗歌应当“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以“音美、形美，义美”（节奏、韵律和情怀）“三美”理论来对诗歌的这种诉求做出回应。现代诗人顾城以他独有的体验和表达，把诗的形式和存在的可能性，向“自我”与“自然”的方向延伸、拓展，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用诗歌构筑的童话世界。[13]而在西方学者看来，诗歌在本质上是精粹的言说，出示心灵（生命与精神）的质。在康德的美学中，艺术美成为一种思想的体现，而所用的材料不是由这思想自外来决定，而是本身自由地存在着。即自然的、感性的事物，情感之类的东西本身具有尺度、目标与谐合一致，同时知觉与情感也被提升到具有心灵的普遍性，思想不仅打消了它对自然的敌意，而且从那里得到欢欣。这样，情感和欣赏就有了存在理由而得到认可，自然与自由、情感与概念都在一个统一体里找到了它们的保证和满足。[14]卡明斯视觉诗中视觉模态隐喻演绎了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存在者内在或外在的辩证存在关系，解构了事物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模式，表征了由这种辩证存在关系构建的美的千姿百态、美的万种风情。[15]

在对艺术进行跨文化定义时，Howard Morphy 认为艺术标准是多种设定的（polythetic）[16]，中国学者也认为“诗是最富民族性的文体”。[17]显然，由于不同民族曾经面临和经历的历史境遇不同，导致他们所产生的审美感受、审美标准有异。而在翻译活动中，民族文化审美制约着原作的选择，本国的诗歌文体观念和传统的审美观念无形中规定和约束着译者的翻译活动。[18]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诗歌翻译所面临的压力还来自国内读者的传统审美心理。[19]以下这首是美国诗人 John William Burgon 发表于 1845 年的诗歌，后随两个版本的译文，均由在美国的华人聪聪翻译。

Petra

It seems no work of Man's creative hand,
By labor wrought as wavering fancy planned;

But from the rock as if by magic grown,
Eternal, silent, beautiful, alone.
Not virgin - white like that old Doric shrine,
Where erst Athena held her rites divine;
Not saintly - grey, like many a minster fane,
That crowns the hill and consecrates the plain;
But rose - red as if the blush of dawn,
That first beheld them were not yet withdrawn;
The hues of youth upon a brow of woe,
Which Man deemed old two thousand years ago.
Match me such marvel save in Eastern clime,
A rose - red city half as old as time.

译文版本一：

佩特拉

仿佛它不是人间巧匠之工，
由人所能构思绞尽恍惚幻想的劳动。
倒像是由魔幻般的岩石长成，
亘古不变又沉默寡言，美轮美幻又孤独伶仃。
它没有多瑞克古庙那纯洁的白色，
从前阿西娜在里面举办着圣典。
它没有许多神庙的圣洁灰色，
坐落在山峰之上敬奉着平原。
但它那玫瑰红色好似黎明的娇羞，
似初见后仍未退去的温柔。
它青春的斑斓刚刚抹在幽怨的眉梢，
可两千年前人类已称之为天荒地老。
再为我找一个这样的东方遗迹，
恰似这玫瑰红色的小城老若半个天际。

译文版本二：

佩特拉

此城何似人工匠？
绞尽脑汁苦思量。
宛若天工石头生，
永恒沉寂孤自赏。
洁白莫比女神庙，
女神当年圣典好。
谦卑难比众庙神，
坐如山冠敬平遥。
红似黎明女娇娇，
欲说还休掩面笑。
淡妆浓抹眉梢怨，
却说垂垂地荒老。
东方奇迹今安在，
伴与不老红城来。

从上述两个版本的译文可见：第一，版本一属自由体，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手法；版本二使用的是归化的翻译手法，大致属于旧体诗一类。第二，对于大部分目标语读者来说，版本一读起来缺乏诗意；而版本二则更加接近中国文化对旧体诗的标准。第三，从翻译的角度来看，版本一更接近源文本，而版本二则远离源文本，也就是说，版本一比版本二更加忠实于源文本。但是从民族审美的过程来看，是否传达了其中的意境，或者说目标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后，诗歌的意境效果能否与源文本读者（母语读者）的意境效果一致？目标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后，其美感能否与源文本读者（母语读者）的意境一致？

接受美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问题。译者虽然在协调两种文化关系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却不得不在两难之间艰难抉择：选择忠实，则有可能破坏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选择照顾读者的体验，却可能背叛原文。[20]125 正如许均先生所言，民族文化审美导致原作形式误译的可能性，因为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都会限制译者对外国诗歌形式的翻译，从而出现“译本对原作的偏离”，[21] 而梁实秋先生则说：“用中文写十四行诗永远写不像”。[22] 应该说，古诗英译有很多质量标准：忠实于传递原文信息、形式和格式（shape & form）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要求，适用于目标读者的；能够体现文化空间的；能够再现历史时间的……。如果给古诗英译的审美定一个标准，而且只能采用一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一定是接受美学的，即让目标读者能够感受到诗歌之美：视觉上简洁之美，对称之美；听觉上的押韵节拍之美；感觉上的含蓄意境之美；体验中的奔放豁达、雄浑壮丽之美……等。对于西方人看中国诗，钱钟书有过这样的评论：西洋文评家谈论中国诗时，往往仿佛是在鉴赏中国画。例如有人说，中国古诗“空灵”（intangible）、“清淡”（light）、“含蓄”（suggestive）……。另有人说，中国古诗简约隽永，……。还有人说，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词藻、形容词和比喻。[23]4

五、诗歌文本的跨文化交流维度

翻译是跨文化活动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然而翻译的内涵也绝不仅仅是文字符号的简单转换。翻译过程充满了爱恨交加的矛盾，同时也是艺术展示的最佳途径之一。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对于翻译有着较多的议论、评论和争论。其中，最受瞩目的观点是可译性问题，也就是翻译能否实现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从极端的意义上来说，文化间的经验和观念是无法交流的，也是不可翻译的，美国哲学家奎因将此称为“极端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24]，或者称为“翻译的不确定性”。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认为，“由于生活经验具有的独特性、与时俱进和不断丰富发展的特点”，能够翻译的东西很少；即便有，“翻译也不过是为了学会接受异国语言而采取的权宜之计”。① 上述观点如果用来解读诗歌的翻译，则更为如此。所以语言学家雅各布布森说：“从定义上看，诗歌是不可译的”。[25]但也不完全，钱钟书说：一个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作为原诗的复制，它终不免是“坏”诗。[26]64即使奎因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他本人也充分认识到翻译的不确定性不应干预翻译活动[27]；同样在《译者的使命》这篇晦涩的文章中，本雅明也认为，文学作品只有通过跨文化交流才有生命力。具体到古诗英译，钱钟书还认为，中国诗具有“高度艺术和活力，具有坚强的免译性或抗译性，经受得起好好歹歹的翻译”[23]6。

如前所述，诗歌的翻译有着诸多难以逾越的难点。翻译家 Florence Ayscough 认为，“对仗是汉语及其突出的特征，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也把它们翻译出来，但汉诗美丽的外形、声韵、节奏及音调——这些都无法传译。”[26]58以押韵为例，翻译理论家 Savory 说，受汉语古诗韵脚的限制，给译者基本的字词选择艺术带来了沉重负担。把一首诗翻译得很押韵，既没有丢失原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又没有包含原作者所没有表达的信息，这样的例子绝无仅有。[26]113而汉语古诗的翻译还要再上一个层次，韵脚是汉语中的一个鲜明特性，通过翻译将其再现于英语之中意味着要牺牲诗歌的其他有效成分[26]113。虽然汉语古诗英译有着诸多的不可能性，但是并不缺乏跨文化的可交流性。可译性和可交流性是跨文化中的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概念；可译性对应的是翻译本位，而可交流性则对应人心互通；也许可译性难以容忍文本背叛的做法，而可交流性则是允许手段多元的解决之道；就翻译本位来说，可译性问题的确存在，但就可交流性而言，人类文化几千年的交往，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②。诗歌存在不可译的特性，但是却具有可交流性。跨文化可交流性的一个最显着的特征就是，要容忍改变，正如 Hanan 所说的那样，“无论用何种翻译手段，一定的变化都不可避免。”[28]如采用民族诗歌的音韵方式，“使中国读者有一种亲切感。”这说明译诗在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形式误译有利于外国诗歌在异文化语境中获得生存空间。[28]美国汉学家王红公（Kenneth Rexroth）在翻译赵鸾鸾的《酥乳》时就体现了这种改变。

酥乳

粉香汗湿瑶琴轸，
春逗酥融绵雨膏。
浴罢檀郎扪弄处，
灵华凉沁紫葡萄。

译文：

CREAMY BREASTS

Fragrant with powder, moist with perspiration,
They are the pegs of a jade inlaid harp.
Aroused by spring, they are soft as cream
Under the fertilizing mist.
After my bath my perfumed lover
Holds them and plays with them
And they are cool as peonies and purple grapes.

这首汉语古诗的改变主要体现在：(1) 在汉语古诗中，读者接受到的是男性的视角中对女性身体

①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with some additions and pagination added here from Zohn, op. cit. (1968)。其原文如下：“life of the originals attains to its ever - renewed latest and most abundant flowering”；“all translation is only a somewhat provisional way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foreignness of languages.”

②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论证，限于篇幅空间，可以另文撰述。

的观赏和赞美，但在译文中，却是“女性诗人对自己身体的欣赏和解放，而不是对被观赏者进行的客观描述”。[29]（2）女性的自我欣赏和追求解放分明是现代化的话语，和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汉语古诗语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很大意义上是与时俱进的时代潮流的体现。（3）这两个改变在翻译中可以称之为改写，具有语境空间的变化，也有语境时间上的延伸，还验证了通过时空的转换，翻译在文化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说明了古诗英译是如何在异国他乡被接受的状况和诗歌的可交流性。这种翻译的路径，在英诗汉译过程中，也是同样的，“翻译过来的思想文化，既不是纯粹外国的，也不是纯粹中国传统的，而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一种交汇。翻译一方面是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进行介绍，即西方的思想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也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中国化了。”[28]这种翻译路径甚至还影响了诗歌的创作，因此，才使得“歌德、海涅、哈代等的小诗偶有中国诗的风味”[23]4；中国诗词带给雷克思罗斯的是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但丁的思乡，在中国诗人那里成为了一门艺术”。[30]诗歌翻译的可交流性还可以体现在跨文化交流的某个历史流程中，即移植（transplantation）、改造（transformation）和变异（transmutation）[31]，即移植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观念和生活经验的翻译传播；在适应另一个文化语境的过程中，文化观念与生活经验得到改造；这些文化观念和生活经验在最后形成变异，演变成为“他文化”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方汉文教授等就中国文明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论述也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过程，该论述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文明的思想，并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促进了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32]

前面所提到有关语言文本的交际维度，即：对话、理解、模糊；语境，范围，方式等在诗歌的翻译中不仅都得到了体现，而且还多了几重意思。如果使用市场理念来论述的话，那么这几重意思就可以包括：1. 诗歌的对话发生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对话人包括源文化文本的生产者（作者）和消费者（读者）的互动，这个阶段翻译尚未介入；2. 当翻译介入的时候，推销人（发起人、译者）向另外一个文化市场推广，这个市场的消费者（读者）有着与前一个文化市场消费者不同的文化理念；3. 由于有了对话，而且是跨文化的对话，语境发生了变化，理解的模糊性，对文本的误读等就在所难免，甚至是有意为之[33]。

六、诗歌文本的译者主体性维度

文学翻译是一项主体性极强、译者主体性体现非常充分的活动。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同样是翻译的尺度，对于文学翻译尤为如此。不仅如此，Wilss 说，“翻译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思维活动，在语言学的框架内忽视作为人的译者就无法穷尽了解这项活动。”① 在翻译的过程中，仅仅对语言层面进行探索还不足以了解翻译的全部，其中还必须去发现译者与文本的关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虽然书写文本的本质是语言，但对于译者来说，解读文本不仅仅涉及语言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的过程中的认识取决于我们对所处世界的理解”[34]。进而，“把自己奉献给翻译不仅需要思想，还需要精神，这就是最终成就一个优秀译者的决定性力量。以往翻译大师身上，就有这些优秀的品格。”②

以上论述试图说明：译者主体性、译者的认识能力与精神对于翻译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译者的意识、学识和见识对译文本发挥着重大影响。也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译者就会生出什么样的文本，文本因人而异，因译者的个体差异而异。另一方面，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时候产生的译本也可能有所不同。李清照的《声声慢》有多个译本，分别由不同时代的译者（包括林语堂、杨宪益、徐忠

①W. Wils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2: 217。原文为：“Translating is a mental, multi-factorial activity which cannot exhaustively be investigated within a linguistic framework ignoring the person of the translator”.

②Jin Di & Eugene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30。原文为：“This (devotion to the task) is the force which, as it involves the spirit, not just the mind, will be ultimately decisive in the marking of a good translator, as can be found in such striking evidence in the life of every past master of this difficult art”.

杰、许渊冲和王红公）产生。现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来看看他们各自的翻译：

林译：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

杨译:Seeking, seeking, /Chilly and quiet, /Desolate, painful and miserable.

徐译：I've a sense of something missing I must seek. /Everything about me looks dismal and bleak. /Nothing that gives me pleasure, I can find.

许译：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王译：Search. Search. Seek. Seek/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Hot flashes. /Sudden chills. /Stabbing pains. /Slow agonies.[35]

由于客观的因素，本研究并没有对上述这首汉语古诗的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情况进行调查，但从上述译文来看，译者主体性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首先，每个译者的词语选择与译者主体性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每一个译者的词语选择都表达了他们对李清照书写文本的理解，也代表了他们翻译时的心情和感受。其次，徐和许的译本采用了更为明确的第一人称，试图解除目标受众对主体的疑惑（如文本中指的到底是谁），但实际上，有时文学文本的最大魅力之一就是不需要太清晰，从而给读者受众留下很多的想象和解读空间。第三，与徐忠杰和许渊冲的译本所不同的是，杨宪益、林语堂和王红公的译本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指称方式，而是采用单个词汇和词组的谓语介入方式，使得文本显得更加接近李清照的源文本，更加忠实；而且林语堂和王红公的译本选择的词语音节短促，显得更有诗歌的节奏感，与源文本也比较相似，其中林海使用了“so”来强调。第四，译者的身份和时代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林语堂学贯中西并久居英语国家；杨宪益国学深厚，有一个跨文化家庭；王红公则是典型的西方白人。可见，不同的学识、身份及文化背景，影响了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及翻译时目标语言的选择和表达。

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个体的识别性特征[20]22，不仅包括认识、学识和见识，也包括阅历、生活环境和成长背景。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译文的生产过程中有着很大影响：在语言学层面，有对原语言的学识转换成目标语的技能；在文化学层面，有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和见解；在社会学层面，有对目标语读者接受状况的考虑；在心理学层面，有译者本人在认识作品过程中的个体心灵状态；甚至在历史学、哲学等层面都会体现译者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由于译者个体性和主体性的影响，文本的风格气质、形式和格式、内涵与外延都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这些都给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带来了多元选择，领略不同文本风景的同时，也使目标语读者对经过翻译所产生的文本开展褒贬不一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与源语读者一样，目标语读者也具有群体性，即不同群体的读者对不同文本的喜好不一，喜好程度的深浅对他们的影响也不一样。

七、结语

本文从五个维度对汉英诗歌文本进行了分析，并认为：第一，汉英诗歌文本（甚至包括其他文学文本）在上述诸多层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导致译文生产过程与路径的根本不同之原因，这充分体现在英汉两种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传统的比较和分析中；第二，本文研究的目标是强调译文的目标语读者接受状态，因此，没有对各种译文作出评价，而是以接受理论的视角来评价译文的质量，这虽然只是评价的一个侧面，却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因为没有被读者接受的译文并不具备其本身的价值，也不具备跨文化交流的价值；第三，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一个翻译策略上的结论：汉语古诗英译时需要在传达原诗形式和意义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表达动态对等，即文本深层的文化对等、诗意和意境的对等，因为民族审美虽然具有某种共性（文化交流的基础），但不同历史境遇所导致的审美心理、审美方式和审美效果却有着巨大差异；第四，诗歌文本相较于其他文学文本具有更多的翻译不确定性，或如钱钟书所言，具有更大的抗译性；但并不是没有交流的可行性，正如迈纳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和诗学研究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想象力，因为过去习惯了的想象力远远不够。”[36] 诗歌不可译的特性与诗歌的可交流性不仅仅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普世性），也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即差异性和共通性构成了诗歌翻译的一个整体，忽视其中的任何一面都可能影响诗歌译文质量、传播效果，乃

至文化解读，等等。而重视和把握诗歌翻译这两大特性是翻译理念和翻译行为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途径，亦是文化间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PETER S. Texture：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 [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2] 高玉. 语言的三个维度与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三种路向 [J]. 江苏社会科学，2006（3）：204－210.

[3] 朱永生. 语境的动态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4]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 [M]. 王宇根，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9，24.

[5] 朱徽.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218.

[6] 葛兆光.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N]. 新华每日电讯，2015－09－25（13）.

[7] 顾正阳. 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溯源 [M]. 许渊冲，译.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

[8] 魏家海. 汉诗英译的比较诗学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1.

[9] 郁龙余. 中西文化异同论 [M]. 北京：三联书店，1989：7.

[10] 宋曦，张文娟，刘正刚，等. 跨文化交流中基于文本的观念转换与生成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87.

[11] NIDA E，TABER C.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E. J. Brill，1969：12.

[12] 王庆奖. 理论与策略：异质文化的翻译研究 [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125.

[13] 江美玲. “自我”与“自然”：顾城诗歌的审美维度之一 [J]. 创作平谭，2005（12）：46－49.

[14] 张晚林. 论中国传统美学对审美实践维度的建立 [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827－835.

[15] 李娅红. 卡明斯视觉诗中视觉模态隐喻的哲性思维模式及审美维度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4）：117－121.

[16] HOWARD M. Anthropology of art [M] //Tim Ingold.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London：Routledge，1994：651.

[17] 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5.

[18] 熊辉. 民族文化审美与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 [J]. 山东外语教学，2009（6）：80－83.

[19] 宋永毅. 李金发：历史毁誉中的存在 [M] //曾小逸.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03.

[20] WANG Qingjiang. Theories & strategies：a study of transl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es [M]. Kunming：Yunnan University Press，2016.

[21] 许钧. 怎一个“信”字了得：需要解释的翻译现象 [J]. 译林，1997（1）：12－14.

[22] 熊辉. 民族文化审美与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 [J]. 山东外语教学，2009（6）：80－83.

[23] 钱钟书. 中国诗与中国画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4] WILLARD Q. Meaning and translation [M]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25] ROMAN J.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C]. Copenhagen：OFT Symposium，1959.

[26] 马红军.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许渊冲的译学理论与实践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7] 吕俊. 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一个译学中哲学误读的纠正 [J]. 上海翻译，2002（2）：1－6.

[28] 熊辉. 民族文化审美与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 [J]. 山东外语教学，2009（6）：80－83.

[29] 黄立.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译笔下的中国女诗人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2）：99－107.

[30] SAM H，BRADFORD M. The complete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M]. Port Townsend：Copper Canyon Press，2003：162.

[31] WANG Qingjiang，ZHANG Yijun. Transplantation，transformation & transmutation—a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 [M] //ZHOU Baodi. The United States in Times of War and Peace（Conference Proceeding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2005：154－175.

[32] 方汉文，徐文. 世界体系与中国文明复兴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6）：42－49.

[33] 王庆奖. 文本、文化与颠覆 [J]. 学术探索，2004（5）：67－69.

[34] SUSAN B，ANDRE L.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137.

[35] KENNETH R，LING Chung. Li Ch'ing－chao：complete poems [M].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9：31.

[36]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 [M]. 王宇根，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